

第三章研究方法

所以，不論這些故事被當成存在主義還是結構主義作品，被馬克思主義還是新康德主義的讀法詮釋，或者進入佛洛伊德還是容格的方法分析，我都開心接受。畢竟，我想欣然指出：據我所知，光憑單單一支鑰匙就想打開一切的鎖，是不可能的事。

Italo Calvino

Il Visconte Dimezzato(1990:11)¹

第一節 常民信仰論述取徑

解釋社會現象的方法不只一種，不同觀點會產生不同的解釋。因此在本論文研究方法的這章中，我必須在一開始說明我對此一研究所持的觀點。

首先，我必須表明我的認識論立場：我們所經驗的世界中，存在著許多的秩序。人類學長期以來一直問的問題是：意義系統是如何組織？Quinn & Holland (1987: 1) 認為若從社會協定、行為及習慣等無須置疑的日常行事中去探索，這些底層秩序結構將顯而易見。這些秩序構成社會世界中的文化模式，成為所有社會參與者共同理解的基礎。我們日常生活中我們及信以為真、視為理所當然的部分，絕大多數就是源自於這些共有模式。

接下來要問的是我們應從何處切入？以及從哪些「痕跡」去探尋文化模式？過去，認知學者多藉由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例如 Holland & Skimmer, 1987; D'Andrade, 1987; Hutchins, 1980)以及探討一般人不經意(native speakers'

¹ 上述引言摘自中譯本《分成兩半的子爵》，紀大偉譯。

intuition)的言談來探討概念的系統性，如隱喻等(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 Kovesces, 1987)來重建文化模式。這樣立論的假設前提為一般人在詮釋和評論事件時的確使用這些模式。不過，如上一章所述，文化模式呈現的是簡化的事實，並無法完全掌握社會事件的複雜性。無論如何，本研究認為，一般人在進行失業議題推論時，的確使用文化模式，儘管這些簡化的模式本身無法完全掌握住議題的複雜性及微妙處，但是我們發現說者具備有動態調整這些模式的能力，以適應不同情境的需求。

因為交談(talk)是社會生活的中心，因為意義的建構是透過知識的架構不斷的精練而成，所以本篇論文是從語言角度來分析一般人的信仰系統。但是不可否認的，從語言及行為等痕跡去推導信仰體系，本來就具有侷限性。Jonathan Potter和Margaret Wetherell (1987：33)認為人們對現象的描述是建立在各式各樣先前存在的語言資源。換言之，在有限的語言資源下，所有的言說都是陳腔濫調，都是已經被說過的(already said)。因此社會世界中，言說的可取得性(availability)也就限制了意義的產製。

除此之外，Potter 和 Wetherell(1987：3-35)也不主張從言說去還原(recover)事件、信仰和認知過程，而是應該去分析言說是如何被產製。他們舉態度(attitude)為例，如果同一個人在 A 場合對相同的事件表達某種態度，但卻在 B 場合持完全相反的態度，又如何能去推導這個人真實的想法？他們主張為什麼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態度，才是言說分析的核心。基於這種說法，他們認為言說會因情境的不同而具有變異(variation)，所以強調語言的功能性(function)及建構性(construction)，主張說者在不同場合對相同現象會產生不同的解釋。

Swidler(2001：6)同樣也指出言說的限制性及變異(variation)。如第二章所言，Swidler 將文化(以符號的觀點來看，文化就是言說)比喻成工具箱及戲目。因

此儘管本研究的受訪者及談話節目的與談來賓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但在面對相同的社會現象時，所動員(mobilize)的工具和方式以及和個人經驗的連結卻也不盡相同。

基於上述的觀點，本文認為言談的情境面不能忽視，也主張如果研究者仔細審視言說結構與情境之間的關係，所獲得的解釋將更為豐富，也能對訪談內容有更為全面、詳細、細微的理解。因此，如前所述，本研究並不反對言說意義是變動的、也充滿變異，不同的人及不同的情境會產生不同的解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似乎也不能排除言說中仍有為數不少的一致性值得探究，而這些一致性，我們假設它在跨情境中仍能維持穩定性及固定性。再者，儘管 Potter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分析言說，認為語言行為並不是心智運作下的產物，因而駁斥認知科學家主張從語言的使用來探尋一般人的信仰系統，然而 Potter 過份強調外在情境面向，卻忽略文化內化一般人行為、思維、和習慣的事實，這些內化的信仰系統，在一般人進行意義協商等交談活動中具體呈現，而這的確影響一般人的所言所行。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研究所持的立場：語言的使用雖不是了解思考及信仰系統的唯一進路，但卻是重要的進路。因此本研究除了分析言談的表面意義，也同樣賦予情境重要性。也唯有如此，才能理解 Potter 所謂的同一般象的多種詮釋；也唯有從語言的表面意義出發，才能進一步去解析 Swidler 的文化為工具箱的隱喻。

第二節 研究介紹

不同的研究方法對常民理論的探討提供不同的貢獻，其中自我評估 (self-report) 是最為廣泛使用來探索常民理論的方法 (Furnham, 1988 : 17)。所謂的自己評估是透過紙筆問卷調查或親身訪談，來了解受訪者對特定問題的看法。不過，結構式的訪談，並無法深入探討受訪對象的信仰系統，甚至可能創造出假的理論信仰。為了避免上述的問題，本研究採半結構式 (semi-structured) 的訪談法，請受訪者針對單一主題 (本研究主題為失業)，盡情地表達感想及看法。此外，半結構式訪談法的另一項優點在於，能讓受訪者重構自身的經驗，比較能夠趨近於受訪者真實認知。

在研究資料的來源方面，採取深入訪談以及媒體談話性節目內容雙軌進行。所有的分析資料皆在 91 年 10 月至 92 年 5 月間完成，這段期間台灣歷經全球不景氣以及 SARS 侵襲的雙重衝擊，經濟首度出現負成長，失業率亦攀上歷史新高。將媒體談話節目談論失業的內容也納入分析的資料來源，是本研究較為特別之處，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進行說明。

本文從媒體來探索常人理論的理由如下：第一，如第二章文獻所提，過去研究顯示一般民眾經濟知識主要來源首推媒體 (Walstad 1996 : 162; Furnham 1988 : 19)，再將這些知識結合個人經驗而形成詮釋或解釋外在現象的個人理論。然而，媒體所呈現是否為專家言說 (expert discourse) 待有疑義，值得進一步釐清。Fairclough (1995 : 9-13) 就曾指出媒體所呈現的言說已經被媒體化 (mediatized)，換言之是透過媒體來發聲。他舉 BBC 科學教育節目《The Work》為例，節目即以淺顯易懂方式傳送艱澀難懂的專業科學知識給閱聽大眾。再者，他指出在談話節目 (talk show) 類型中，一般人的聲音及經驗比專家更受到重視，而專家的聲音

受到媒體情境的框限後，呈現的也是媒體化的言說。因此，Fairclough 認為儘管談話節目有意呈現眾聲喧嘩(the diversity of voices)的現象，但實際上，這些聲音都只不過是俗民的聲音(lay voice)。

第二，Furnham 引用歸因理論將研究重點放在大眾對「失業」等經濟議題成因及解釋進行分析，並沒有處理常民經濟信仰與媒體之間的關連。本論文認為媒體對型塑人們認知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處於媒體發達的時代，要找出單一的媒體如何設定閱聽眾腦海中心象並不容易，但是不同的媒體扮演一般社會大眾重要議題知識的來源卻不能忽視。

如上所述，媒體一方面呈現的一般大眾常民的聲音，另一方面媒體也是常民主要的經濟知識的來源，那麼媒體在俗民經濟信仰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這裡我有必要先將媒體在本研究所被置放的脈絡詳加說明。在閱聽人的研究中，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認為文本與閱聽人並非分開分析的單位，而是被整合在一起，全部成爲日常生活實踐(daily life practices)。(轉引自林芳玫，1996：160)。這種強調整體觀(holistic approach)的取徑，提供了我進行本研究的立論基礎。所以，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媒體與常民來自於相同的文化社會，因此他們在失業的俗民理論或信仰結構上必有相重疊之處；另一方面，媒體所傳達經濟信念，一般閱聽人也不盡然全盤接受，因爲常民有屬於自己的一套理論。事實上，常人彼此之間的理論也因人而異(鍾蔚文，1992：101-2)。此一事實，則是呼應了Swidler(2001：22-3)說法：文化具有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人所擁有文化工具箱中的資源不一，使用的方式當然也就不同。這種變異(variations)發生在常人之間，常人與媒體之間亦如此。

基於上述的理由，在我進行研究之中，一方面延續文化研究的主張，將談話節目及常民間界線模糊，從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中切入，探尋常民的失業的理

論。但在研究時仍將談話性節目及常民的訪談視為兩個互動但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分開處理的範疇，因為媒體與常人之間的變異性也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本研究與傳統閱聽人研究不同地方在於，如前所述，我並不把常民的經濟信仰系統放在研究中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的位置，與談話節目中信仰系統具有有限性的因果關係。傳統的收訊研究或日後的詮釋學派針對的是單一文本對閱聽人進行解碼及製碼研究，但本論文並不遵循此一進路。由於常民信仰是由內在文化基模及外在知識及經驗世界不斷形塑而成，絕不是單一的文本能改變或撼動。所以，訪談受訪者是要了解他們如何組織這些信仰系統，並非分析受訪者觀看談話性節目後的感受。

第三節 談話性節目

研究脫離不了取樣的問題。台灣電視新聞頻道及談話性節目眾多，選取哪些樣本不僅是研究重要課題，更會引導研究的走向。在本研究中，我採取的是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依據研究的目的來選取研究的樣本。

在進行研究前，我曾對目前電視頻道中的談話節目進行觀察，發現大部分的談話性節目會依當天議題熱度，來選取談論的話題。不過談論的話題主要圍繞在政治議題上，甚至有的節目是配合國內所舉辦選舉而特別增設的，在選舉結束之後，節目也宣告停播。因此，選取節目的第一項標準就是考量節目播出穩定性以及節目模式呈現一致性。符合上述標準新聞談話節目有「新聞夜總會」、「新聞挖挖哇」以及「新聞駭客」三個節目。接下來則是鎖定節目內容，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常民的失業理論，因此我再從這三個節目中篩選其中有關探討「失業率」、「經濟不景氣」等相關主題的節目。由於「新聞駭客」議題的選擇上比較偏重在政治領域，並沒有符合本研究相關主題，最後選出「新聞夜總會」二集以及「新聞挖

挖哇」一集。

接下來要談的是，我如何進行談話性節目的分析？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應先就電子媒體做為一特殊的文本(text)，究竟有哪些意義的符碼具有溝通的力量而應被那納入分析予以說明。二個節目具有一共同的特色，精心設計的開場並輔以音效烘托出節目的特色。不管是「新聞夜總會」的現場鍵盤(keyboard)演奏，「新聞挖挖哇」輕鬆詼諧搭配動畫的卡通音樂所呈現出來的風格都迥然不同於一般新聞性節目。「新聞夜總會」及「新聞挖挖哇」加入屬於綜藝節目娛樂的元素非常明顯。

這兩個談話性節目的另一項共同的特色為對話語體(conversationalization) (Fairclough, 1994 : 12-3)的使用，主持人及現場來賓都以一般人的身分，與現場參與者互動，分享自己的相關生活經驗即常理之見。兩節目呈現大量對話語體，最明顯的是口語(colloquial vocabulary)的使用，例如：「對不對」、「你知道嗎」、「這個樣子」等。受邀的來賓鮮少使用艱深的專業術語，有時來賓更使用詼諧的隱喻來製造笑點。在我抽取「新聞挖挖哇」的一集中，主持人還會提醒在場的與談人用「最淺顯的方式」來解釋全球化的概念。台語在「新聞挖挖哇」最常使用，這種的語言轉換(code-switch)不僅是說者基於溝通上的方便，表現出自我的族群認同，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來賓或主持人，使用台語所表達出的熟悉感，也呈現出語言聚合的現象(黃宣範，1993：287)。談話性節目中對話語體化用意並不僅是要拉近觀眾的距離，根據 Fairclough(1995：12-14)的說法，大眾媒體的節目中對話語體的大量使用，呈現的某種程度的文化民主化(cultural democratization)。也就是讓艱澀難懂的專業知識與以平民化，讓更多大眾得以接近。

二個談話性節目參與討論的來賓有三位，事實上為了確保受邀來賓來源，不至於出現不同頻道卻出現相同來賓的窘狀，每一個節目都有固定與談班底

(panel)，而這些受邀的來賓多來自於平面媒體的記者。在節目的設計上，參與的來賓在理想上希望能呈現多元，不管是在黨派、性別、階級及觀點上會做刻意的安排，眾聲喧嘩(diversity of voices)討論結果也較能帶動電視的與談氣氛。以十一月一日的「新聞夜總會」為例，三位特別來賓分別代表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而在九月二十四日那集中，節目還邀請了兩位失業來賓現身說法。

節目內容都轉換成逐字稿，以利分析。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電子媒體所產製的符號意義也絕不是單獨從逐字稿中可以呈現的。Fairclough(1995：125-49)就指出在媒體的論域(media discourse)中，參與者其實是具有認同(identity)及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而這種權力關係並不容易從語言的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中呈現。他舉著名的談話節目 Oprah Winfrey Show 脫口秀為例，節目讓專家、及一般大眾都有發聲的空間，但這些來自不同意見的聲音如何整理，哪些聲音框限了其他不同的聲音，以及哪些發言被階層化(hierarchized)都是值得分析的焦點。最重要的是，Fairclough 認為 Oprah Winfrey 本身在身分的認同上就非常的複雜。節目中她控制了象徵發言權的麥克風，同時也對所有發言人的貢獻度進行評估以及控制發言的長度，並尋求衝突意見的調和。Fairclough 認為 Oprah 在談話性節目中扮演的不僅是主持人的角色，有時甚至身兼教育家及藝人(entertainer)的身分。

就我所抽樣的節目中，主持人李艷秋在「新聞夜總會」中，除了發問之外，也擔任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對討論議題進行背景說明及解釋，而製作單位常準備有看板或電腦繪圖(俗稱 CG)讓李艷秋便於說明。于美人和鄭弘儀在「新聞挖挖哇」中，最明顯的是他們兩人都加入來賓的討論，不僅控制發言權，也會參與發言討論，甚至扮演觀眾的角色，對來賓所提出的內容投射出自己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新聞挖挖哇」在來賓發言上較不受限制，也因此常出現現場來賓互相對話的情形。

從上述的分析中，對話語體、大眾口語化的模式以及語言轉換平民化是談話節目最大的特色。這種所謂溝通風格(communative style)(Fairclough, 1995:148)呈現出重要的意涵。當主持人及與談者以這種溝通風格向觀眾表達概念，也等於宣稱他們與觀眾是處於相同的生活世界，間接否定與觀眾之間發言位置、觀點、興趣的差異，同時也向觀眾表達，節目正在進行討論的是大家日常生活常見話題，媒體談法和一般觀眾認知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從節目呈現方式、與談來賓的談話模式、以及媒體言說的特性來解析談話性節目，在於說明本研究為什麼要將這兩個節目納入分析的原因。本文認為儘管媒體具有商業利益或是意識型態的考量，若從整體觀的角度來看，談話性節目所傳達的失業言說，也能看成是與談來賓對失業現象所發表的個人理論。在這些個別理論的言說中，同樣充滿個人的社會態度、隱喻式語言以及失業成因敘事的推論、歸因和咎責。因此，就本研究認知結構觀點來看，媒體的言說也能看成是常民的言說。

第四節 訪談

訪談的目的是要去了解人們如何理解他們的生活經驗(Seidman 1998 : 47-48)。因為我的研究所關注的是一般人對失業的看法，因此訪談目的是為了取得常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信仰系統的模式。至於要了解什麼？哪些常民的解釋必須關注以及調查？Furnham(1988 : 7-16)主張，如果我們要探討有關經濟的常民或常識(common sense)信仰，就必須了解關於經濟的常識信仰是如何發展、以及它的穩定度、一致性、和常識信仰之間的因果關係、轉變及結構。

為了探尋人們對失業的想法，我訪談了十四位台北縣市市民，大部分為我們熟知的中產階級上班族。訪談時間約莫一小時，整個訪談經過受訪者同意，都有

進行錄音。本研究使用兩種訪談格式，受訪者先進行基本訪談，訪談的目的除了取得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資料之外，主要是蒐集受訪者對失業問題的理解、對失業成因的詮釋、以及哪些個人信念或經驗影響受訪者的觀點。第二部份為場面訪談(vignette interview)²，所謂的場面訪談即透過假設性的場景及故事，了解受訪者對此一故事劇情結構的反應。本論文選用四個有關失業新聞的報導，就是希望探尋一般人在面對不同的失業情境故事時，會出現哪些不同的看法及理論(詳細說明參見下一小節)。每位受訪者進行完基本的訪談之後，隨後進行場面訪談，並針對不同的失業故事回答三至四個問題。受訪者為居住在台北縣市的中上階級為主，普通話(Mandarin)是訪談中最主要的用語，雖然訪談期間偶有使用閩南語，這些都是訪談者及受訪者熟悉及使用的溝通用語。

一、基本訪談

因為我的興趣在於探索常民對於失業所發展出的一套理論及文化模式，受訪者必須要有求職或就業的經驗，因此受訪者的年齡是分布在二十至六十歲間。我並沒有將目前正值失業狀態受訪者排除，原因是我想要去發現失業者如何重塑對失業或工作的理解，尤其是處在失業的時期。爲了要讓受訪者能夠以輕鬆閒聊的方式談論失業，因此訪問的前段我花了一些時間和受訪者談論目前台灣的經濟情況，而訪談的目的爲：

(1)探尋有關失業、工作等一般信仰結構，同時更細緻去看受訪者的失業歸因，(2)發現信仰系統所呈現的共同點。最重要的是，透過訪談，得以了解一般大眾是如何運用常識(common sense)在解釋失業這個現象上。

(一)受訪對象

本研究既名爲常民失業理論探討，因此受訪對象必須符合常民的定義，但是

² 場面訪談(vignette interview)一辭，來自於Swidler在《Talk of Love》一書。

常民(lay people)概念定義並不容易。梁忠(1997)曾從統計學的觀點表列出專業人士分布情形，並提出在極專業及非專業的兩端，應該如何選取樣本作為研究對象等方法學上的問題。在實際的研究操作上，他引用的研究假設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專業知識都很差，只有少部分專家。」(P.114)因此在他的俗民政治新聞解讀研究裡，受訪對象選擇，是以大學生非政治科系為主，原因在於他所要探討的是常民的政治信仰。

梁忠的選擇，顯現出他對常民的定義。然而，究竟哪些是研究所必須排除的專家？哪些才是本研究要採訪的常民？本研究認為每個人所持有的理論會在質和量上呈現個別的差異，個別經驗及需求會導致這些理論的差異。例如：農夫比起一班都市的上班族就發展出比較複雜的氣象理論；有小孩的夫婦對小孩發展理論也不同於那些選擇不要有小孩的頂客族。同樣的，醫療專家可能對病毒控制或自己相關學門領域具有專業、「科學」的知識及理論系統，但對其他社會現象的了解卻有可能是生手。換言之，一個人可能在其專業領域是「科學家」，也同時可能在面對其他社會現象時是「常民」。

也因此受訪者選取上，我採取的方式是排除所謂的專家。最重要的是，在呈現失業的言說上，必須要是常民的聲音。我在第一章已經提過，常民的失業言說和專家的失業言說仍有差別，儘管談話節目言說已經媒體化，但是本研究的另一項資料來源—訪談則不具媒體作為中介，因此在採訪對象上，我必須針對受訪對象的背景進行篩選。因為本研究焦點既然放在常民的經濟信仰上，因此受訪者也就不能為經濟學者、政府執掌經濟相關官員，甚至更嚴格些，不能為主修經濟等相關領域的學生。誠如我在第二章中文獻探討所提及，國外的研究顯示，在各項變數上，性別及年齡差異不大，不過在教育及投票行為則出現較大的差異，而本身就業與否也會出現歸因的差別(Furnham 1988：20)。此外，宗教信仰如清教徒也是重要的變數。因此在受訪人數及背景的安排上，我盡量呈現多元性，不論

是在性別、年齡、教育背景、職業或就業及失業與否，希望能從受訪者多元背景，獲得多樣的認知理解模式。

值得一提，本研究與典型的社會學研究不同，因此受訪民眾並不具所謂統計學的代表性(statistical representiveness)，由於樣本數不大，也不符合一般社會學中典型城鎮的人口分佈情形。原因在於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討人們如何組織既有的信仰系統，而不是這些找出哪些特別信仰的特徵會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如性別、階級或宗教信仰)呈現出不同。此外，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失業者與目前為就業狀態者，在歸咎失業原因上並不相同，也因此受訪者也有目前是處於失業狀態或曾經失業的成員。有趣的是，訪談之後發現，連「失業」簡單的概念都出現一些細微的差異。舉例來說，3號受訪者雖然已經有十年沒有工作了，他卻不認為自己失業。他十年前從事建築業，不過因為台灣歷經建築業不景氣而將公司結束，期間雖然有東山再起的計畫，不過都在評估風險之後收手。13號受訪者今年(2003)三月從研究所畢業，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強調自己不是「失業」而是「待業」中。而取得律師執照前的8號受訪者，也曾經經歷過一段找不到工作時期，她認為「待業」和「失業」其實沒有很大的差別。

尋找受訪成員，我採用的是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一開始，我的訪談對象是從我個人人際網絡挑選，然後再由他們推薦受訪者。其中一些是他們的朋友、同事或同學，或是他們在訪談中提及的對象。因此，我個人人際網絡的採訪對象，將非常不同於種子受訪者所推薦的對象。不過任何一條人際鏈結，以不超過三名受訪者為限。為了避免抽樣偏差，我盡量避免種子受訪者推薦朋友受訪，因為我認為朋友在背景及看法上比較傾向一致。

除了樣本偏向中產階級之外，受訪者的工作狀態失業的比例也遠低於就業比例。原因除了失業人口本來就比較少外，在我麻煩受訪者推薦失業中的朋友或同

學時，受訪者多半擔心訪談會再次刺傷他們目前失業的心情，因此大多婉拒。下表為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包括他們目前的工作狀態、教育背景及政黨傾向。

表 3.1 受訪者背景資料

編號	工作狀態／職業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政黨傾向
1	退休／教師	女	53	大專	泛藍
2	就業／文教機構總經理	男	41	研究所	泛藍
3	退休／建築業老闆	男	61	大專	民進黨
4	就業／執業律師	女	33	研究所	民進黨
5	就業／理髮師	女	34	高職	未表態
6	就業／業務	男	36	高職	無黨
7	就業／汽車維修	男	30	大學	無黨
8	曾經失業／執業律師	女	29	研究所	泛綠
9	就業／記憶體通路商	男	33	大專	泛藍
10	曾經失業／學生	男	30	研究所	民進黨
11	就業／俱樂部業務	女	32	大專	新黨
12	就業／教師	男	35	大學	泛藍
13	曾經失業／行銷	女	26	研究所	無黨
14	曾經失業／媒體	男	31	研究所	國民黨

由於擔心失業的受訪對象在訪談中，會出現防禦心態，對他們的生活及看法會出現保留的態度，因此，我讓推薦他的受訪朋友同行。一方面讓訪談的過程能夠輕鬆地進行，另一方面，我認為有熟悉的人在場，他們會比較樂意表達自己的情緒及看法。

一般說來，受訪者喜歡接受訪談，雖然一開始聽到我訪問的目的是為了寫碩

士論文而來，有的人謙虛的表示自己可能不夠格而拼命推辭；有的人認為自己對經濟的問題並不在行，還開玩笑的說自己不太看《商業周刊》。經過一番好言相勸，表明雖然做的是學術論文，但訪談都跟生活經驗有關(我進行的是 common sense 的研究!)，最後也都接受訪談。

在進行完十四位受訪者之後，我發現受訪者還都喜歡談論自己、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信念，而且也關心我所進行的研究議題—失業。儘管在訪談期間，我盡量讓訪談的過程友善，不過必須要提出來的是，讓訪談情境輕鬆愉快，所使用的策略其實是不大一樣。有的受訪者對我的訪談存有戒心(通路商老闆甚至認為我是調查局派來查稅的，拜託！負責查稅的是國稅局)，因此我會先對受訪者有興趣，侃侃而談的問題切入。

由於本研究旨在分析一般人如何將其信仰及一般的常理之見連結到失業的概念中，因此訪談中互動的品質是相當重要的。受訪者的態度是真誠的？還是具有防衛性？我會不會過度引導或暗示受訪者朝向特定的方向回答？以及我和受訪者之間是否建立互信的關係？受訪者當天心情不佳、思緒不順？或者是當天受訪者讀到了哪些有關失業的報導，看法受到報導觀點的影響？

我必須要說上面的問題我並沒有答案，也無法全盤了解。不過每一次採訪我都盡可能讓這些干擾問題減少。雖然每個人的都有談話的風格及方式，這當然是構成個人的特色的重要因素，不過我必須要強調這並不影響我希望從交談中了解經驗是如何整合的，以及文化模式如何影響一般人的思考和推理。

(二)訪談問題

本論文基本訪談部分是採用為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因為半結構性訪談給予受訪者較大的空間及自由來回答問題，讓

受訪者可以盡情表達自己的看法，這正符合本研究希望受訪對象能針對失業主題盡量表達感想。和結構性訪談比起來，半結構訪談雖然在討論主題上有所範限，不過訪談的過程比較接近自然情境中，所發現的認知架構也比較接近一般日常談話的真實情境，而非結構性訪談則有時間效率上的缺點。訪談集中在了解一般常民對失業及其衍生相關經濟議題的看法，以及如何解釋這一種社會現象。再從這些訪談中去分析哪些是穩定的、有秩序的、可預測的信仰系統，哪一些則是相互矛盾、不一致及混淆常理之見。

本研究也希望受訪者以自己的觀點，重構(reconstruct)自身熟悉的生活經驗，表達究竟「失業」現象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為什麼會有失業的問題。訪談的問題是從我的分析架構發展出來，經過與前導受訪者(pilot interviewee)互動之後，重新修正訪問問題可分為二類：

- (一) 你認為目前台灣的經濟情況如何？如果受訪者回答「不景氣」、「工作難找」則進一步追問對目前台灣「失業」問題的看法。
- (二) 經驗：對就業者而言，提問「周圍有沒有失業的人？」或是利用想像、假設情境及角色扮演(role-playing)讓受訪者思考「萬一失業可能的原因為何？」的問題。若是失業者則是盡量讓受訪者重構失業經驗，焦點集中在這些深刻的生命體驗如何影響他對「失業」的看法。

訪談的目的是在發現文化模式或是常理之見滲透或形塑個人觀點的方式。因此，無論是一般訪談或是我下一小節所提的場面訪談，我會讓受訪者盡情表達他們的看法，以便了解受訪者組織日常的經驗以及觀察的方式，進一步理解哪些文化模式引導這些觀點。當受訪者使用一般說法如「高不成低不就」來解釋對失業者失業的原因時，我會再追問，要求受訪者給我具體的案例，了解究竟是哪些觀察，讓他做這樣的判斷。相反的，當受訪者談及特別的案例時，我也會要求他們進行概推，以了解受訪者如何將具體案例，擴展成抽象的概念建構。一如

Billig(1987)在《爭論與思考》(*Arguing and Thinking*)一書中所提及：分析立論(argument)到概推(generalization)的認知過程，一般、常理的思考於焉產生。

我同樣也在訪談的過程去探尋受訪者的觀點是如何產生：哪些立論的邏輯不見了或是有了問題？哪些立論看似合理，實際分析之後則不然？訪談過程中，我會試著去點出受訪者觀點矛盾之處，或是提醒他們問題的複雜面，但是不會以權威者的立場直接去挑戰受訪者的看法，而是先同意受訪者的觀點，再以委婉語氣問「對，但是會不會有這種的可能…」不過，根據我訪談的經驗，通常受訪者多半不會改變他們原本的立論，而是更加捍衛、重覆、或更深化他們的立論，或是提出補充的面向或假設的情境進一步解釋他們的觀點。

二、場面訪談(vignette interview)

進行完基本訪談之後，我再針對受訪對象根據一組假設性的失業故事或場面(vignette)繼續提問。這些失業報導則是包括畢業即失業、中年失業、高學歷失業等故事，希望藉由明確的場景案例，分析並檢視受訪者在面對不同失業情景的回應。本章一開始即指出，不同的情境會產生多樣的態度及言說，因此我們不宜也不應以抽離情境的方式來看待文化意義。所以，這樣研究設計希望藉由不同情境的呈現，能夠更詳細、全面的捕捉受訪者信念及思維方式。

場面訪談的研究設計，是受到前導受訪者訪談內容所啟發。在訪談前導受訪者時，我發現他會使用一段週遭的故事來說明他對失業的看法，而相同的情形其實也出現在參加談話節目的與談來賓中。事實上，一般人在進行交談時候，發話者與收話者都會架構出一個想像的場景。他在訪談中提到他在登山協會一個目前失業的山友，對教育部決定聘請外籍老師至偏遠地區教英文政策所做的反應和批評，他描述當時情景、對話，以及後來對他的個性、能力表現的評論，我當時感覺我跟著受訪者所描述情景，腦海同步呈現出這位山友的圖像。從這段場景說明

(scenario)中，我發現失業角色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鮮活呈現在我的面前。

除了鮮明的圖像之外，我認為場景說明背後所代表的是框架(frame)³的選擇及使用，反映的其實是發話者的價值及態度。相同的，收話者在接收發話者所描述的場景之後，也會啟動其內在基模，連結相關的生活經驗及信仰，呈現自己的看法及判斷。基於這些理由，我決定增加場面訪談，以探索受訪者如何根據個人的失業理論，來解釋不同的失業現象。我認為，從受訪者連結自我理論到解釋立論的過程，可以分析出受訪對象的信仰系統及知識結構。

這裡我必須解釋我所採用失業的故事。在接受先前的訪談之後，受訪者先閱讀我所準備的四則有關失業的報導(報導全文及訪談內容請參見附錄)，這些報導都和我所抽樣的談話節目內容相關，是談話節目與談來賓談到的相關案例或議題，分別是「主計處公佈失業率創新高，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失業婦女攜子自殺」、「研究所畢業找不到頭路開計程車」、「失業男子犯下強暴罪」。選擇這四則新聞是刻意連結談話節目的內容，目的除了就失業的歸因、失業與自殺率、失業與犯罪率、畢業及失業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之外，最重要的是探討受訪者對特定失業情境的解釋，有助於本研究理解受訪者是如何將自己的經驗、信仰組織且融入在本研究的情景中，以及受訪者針對這些案例，如何和相對的社會問題進行概推。

每一則報導都有清楚的人、事、物，以及因果連結，也就是失業所導致的社會問題，以下面一則「失業婦女攜子自殺」報導為例：

³ 最先提出框架(frame)概念的學者為Goffman，他所著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受到學者的重視。認知心理學家Gerhards & Rucht (1992)曾追溯Goffman的定義，認為「框架」是人們解釋外世界的心理基模(schema)，作為理解、辨認、界定(define)行動經驗的基礎。

彰化花壇鄉，今天發生母子燒碳自殺的家庭悲劇，婦人朱秀貞因為長期失業，為了籌措孩子們的學費，經濟壓力相當大，終至攜帶罹患憂鬱症的兒子燒碳自殺，母親到院前已死亡，十八歲的兒子則陷入昏迷中。

受訪者讀完這則報導後，必須回答二至三題的後續(follow-up)問題，問題的設計和故事內容相關，每則報導的第一題問題主要是了解受訪者對事件所做的因果推論。以這則中年婦女攜子自殺報導為例，我會問受訪者「誰應對婦人朱秀貞的境遇負責？」。接下來讓受訪者表達對目前台灣失業情形的一般觀感，「你認為台灣中年失業嚴不嚴重？」。最後則是希望了解受訪者對報導個案中所透露失業與社會問題間歸因連結的看法：「你認為失業率升高與自殺率升高相關嗎？」。

題目的設計是為創造一個矛盾的空間，目的在驗證受訪者在表達自己的看法時，能否維持理論(常民理論)的一致性。以第一題「主計處公佈失業率創新高，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為例，受訪者被問到誰應該對失業負責時，會回答政府應該負責，但是問到是否同意畢業即失業時，受訪者又表示這是畢業生個人不願就業的藉口。顯見一般人對失業問題存在有不同面向的看法。

前面提過，這個訪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特別情境的安排，而抽引出訪談對失業概念的理解以及詮釋。這個策略我個人認為是成功的，有許多有趣的現象值得一提。首先是受訪者對設計情境回應。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具有能力去領會比簡短報導所呈現出更多意義，這說明共有理解基礎的文化模式在此發生作用。受訪者透過想像，能夠理解報導中人物的處境、以及失業帶給失業婦女的壓力，最後再對這則報導進行詮釋。

A：她自己應該對這件事情負責。

Q：為什麼？

A：因為我相信一定有人比她更悲慘吧，因為我覺得像這種籌措學費的事情的話，有很多其他的管道。

Q：比如說？

A：媒體啊，報導出來之後，應該會有人願意幫助他，然後她等於說自己活不下去，就把小孩給拖下去，那我覺得這個太不人道。(編號 12 受訪者)

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同時也傳達他們的態度、規範、價值。場面訪談中這些鮮明的意像提供組成個人文化理解基本要素。此外，受訪者對報導的回應，或是對問題所表現出的態度事實上和如何框限議題，以及哪些場景被問題所促發有關。無論如何，重點是本研究發現受訪者通常受到特別場景所呈現意涵，而影響其態度及價值。例如不同的受訪者若注意到報導中不同的細節，會根據這些資訊，重新還原故事的輪廓，態度也就不一：

報導二談到母子自殺的問題，這是一個悲劇啦。但是我想她自殺的原因除了失業之外，兒子的憂鬱症應該也是一個問題，然後我在這裡，比較懷疑的是這個人的父親到哪裡去了，所以我認為這個不是社會的常態，而是社會的一部份的情形。(編號 1 受訪者)

受訪者注意到張姓婦人「兒子患有憂鬱症」的細節，而這個細節成爲他推論張姓婦人自殺的原因，也因爲「兒子患有憂鬱症」的事實，受訪者認爲這只是個案而不是常態。

第五節 敘事

上一節描述場面訪談的使用過程，這一節則要進一步說明場面訪談的理論背景。在這裡要先指出的是：我將訪談看成為敘事的過程(narrative process)，而非單純的回答。受訪者根據每一則失業報導所提出的看法，是將報導中的各項元素重組之後，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說出來，因此訪談的過程就好比說故事一般。(轉引自林芳玫，1996：104；Collins, 1985; Labov, 1982; Mishler, 1986)。

事實上，訪談讓受訪者視自己為連貫性的整體，也因此會維持敘事的連續性(narrative continuity)、連貫性(coherent)以及正當性(proper)。Linde(1993：3-5)稱這種為了符合社會規範，而呈現一般社會大眾能接受、具有融慣性、不斷修正的敘述、詮釋或記敘就是生活故事(life stories)。

Linde(1993：22-25)針對一般人的生涯職業選擇，發展出生活故事的概念，她認為生活故事必須符合下面兩項標準，首先說者必須表達出自己的評估觀點，類似像：「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或是「你不可以相信二手車經銷商」藉由生活經驗表達個人的觀點。另一項標準則是具有報導性(reportability)，換言之，生活故事經過長時間之後，仍要能被傳達、轉述。

Linde 論點提供本文從敘事的角度來探討一般人的常識觀點，因為這些敘事的概念事實上一直以來都由相同社會文化中的成員所使用，而且被看成是我們日常行事的一部份。從這種敘事方式，在本研究訪談對象的失業言說中，我發現受訪者表達自己或他人的失業經驗，或是將場面訪談故事元素重新組合，呈現他們對報導中失業故事的看法，實際上是根據共有的文化架構所編織出來的失業故

事，因此在故事敘事之下，含藏文化模式(Linde, 1987; Price, 1987)。

事實上，許多不同的文化模式存在於言說之中，但是有關於社會角色的情境知識具有最為豐富的文化模式(Price, 1987：313-318)。所謂的情境知識是由特定的文化模式所組成，包含了對一般人所扮演社會角色的概推，所從事活動的意涵，以及與特定情境相關的角色認同(role-identities)(Holland, 1985)。Price(1987)就以情境知識觀點出發，從厄瓜多爾人(Ecuadorians)的疾病故事中，探尋家庭、親友、社會階級的文化模式。

Linde(1987：344)則是關注職業選擇的敘事中，特有的省略(characteristic omissions)部分。她訪問了 14 位美國人，談論選擇目前工作的原因，結果發現在解釋系統(explanatory system)中，亦即提供說明因果關係概念背景裡，有某些觀點是受訪者沒有碰觸的部分。例如，沒有人提及經濟條件或階級限制是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多數受訪者假定職業選擇是受個人能力，以及個人心理調適所影響，而避免去談論機會的問題。Linde(1987：353)認為這些省略的部分反映的是典型美國人觀點，以及職業選擇的文化模式。因此，從敘述者(narrator)—受訪者—略而不談的部分，也能挖掘出文化模式，原因在於敘述者在說明時，假定這些都是共享文化知識(Linde, 1987; Price, 1987)。

此外，在訪談的過程中，我發現失業敘事充滿了情感的意涵。儘管一般人通常在對話中是以含蓄而非公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這是因為相信談話中直接透露自己的情感違反了社會互動的原則(Price, 1987：332)，然而失業的故事充滿情緒感受。例如，具有失業者表達自己找不到工作的痛苦或憤怒，非失業的受訪者同樣也會藉由失業原因的推論，來表達對失業現象的感受，因此情感可以說是失業故事中相當顯著現象。如果說失業的文化模式引導失業故事敘事的方向，那麼情感則賦予這些模式真切的感受及力量。

基於上述的論點，本研究提供四則有關失業的新聞報導，旨在提供不同的失業情境，然後從敘事的角度探索常民的失業文化模式。藉由不同新聞故事(stories)及場景(scene)述說，讓受訪者進入失業者故事，進一步檢視受訪者對不同失業劇情結構的反應。

爲什麼我會認爲場景如此重要？首先我認爲場景是受訪者在思考失業概念時不可或缺的部分。如前所述，本研究希望從敘事的觀點，檢視是否不同的情境故事會產生哪些不同社會角色的認同，因而導致不同的失業歸因的方向；再者，場景提供受訪者組成失業故事的元素，從訪談者新的失業故事敘事中，也可以檢視哪些理所當然、不說自明文化要素被省略；最後，場景提供探索受訪者情緒的工具，了解哪些場景喚起了他們的憤怒或同情。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資料分析

一、談話的本質

一開始進行資料分析時，最讓我感到困擾的就是「談話」本身--談話性節目的對談，以及我和受訪者間的交談。例如當我問到 1 號受訪者，誰應該對失業負責，他回答說：「大家應該負責。」如果在採訪的當時我一時疏忽而沒有繼續追問，我將很難理解所謂的「大家」指的是誰。再者，參與談話節目的與談來賓，很多是平面媒體所謂的資深記者，因此在談到相關主題時，多半會提到與自己採訪經驗有關案例，不過這些案例多半與主題無關。例如某位常跑社會線的記者，花了很多時間在講述遊民現象，但卻都沒提到這和失業有哪些關連，最後主持人卻將這當成橋段，總結「這真是蠻嚴重的現象…，現在讓我們來了解一下這個問

題(失業)」。

拋開這些指涉不明，因果連結有誤的問題，事實上談話本身牽涉複雜的技巧以及對問題的理解。因此，要精準抓住每一個人的主要想法(idea)，並不是容易的事。Sweetser(1987：43)指出，光是單獨的一句話就可能具有多重的目的。Sweetser對謊言以及Kay(1987：67)在模糊限制語(hedges)⁴研究，證明談話的複雜性：不僅需要具有語言能力特有的文化知識，還需要對所談主題中非語言世界的文化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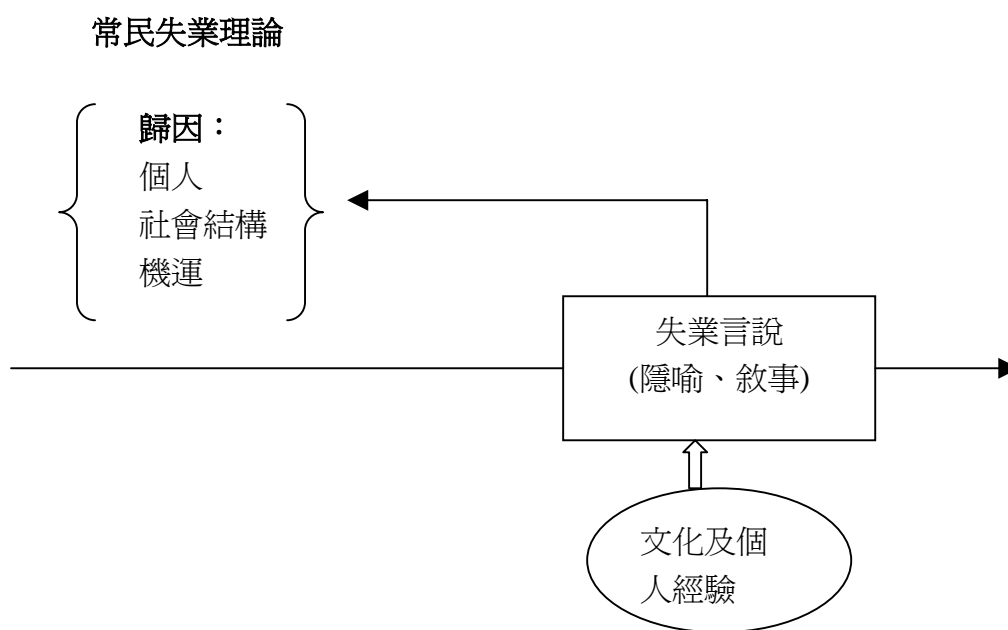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Swidler(2001：161)提到談話可能呈現不僅是談話本身，還有談話情境本身之外的多重意義架構的連結。因為，不管訪談過程如何小心謹慎，還是無法完全掌握任何單一言說中所有的機制(institutions)、符碼(codes)、社會脈絡(context)。儘管我們可以透過訪問取得受訪者的教育背景、個人歷史、認同或興趣，但是仍無法得知是哪些意象、文化符碼、或是想像的情境架構對談中特別的部分，這種問題尤其在第二層的受訪者最為明顯，因為我對他們的背景並不像種子受訪者這麼了解(本研究採滾雪球抽樣)。在訪談中，受訪者在重新架構情境及意義的假設後，有時候會轉變觀點，而且通常是在對話中不經意的改變。舉例來說，9號受訪者在暢談個人失業理論時，指出現在的求職者「沒有與學歷相稱的工作能力」，隨後話鋒一轉表示「這幾年經濟哪有景氣過？」前後觀點及敘事框架轉變之快，很難去捕捉整句話前後脈絡。這正指出這些機制、符碼、社會脈絡在脫離談話中的軌道之後，是很難再從談話中抽離出。

二、分析架構

「失業的歸因」是對失業現象進行因果關係的推論，而「失業的影響」則是

⁴Kay所研究的英文模糊限制用語(hedges)包括loosely speaking和technically兩種。

失業現象可能造成後續的社會問題。本研究發現不管是談話節目或訪談內容，都包含上述兩種概念。無論如何，一般人對失業的原因具有較為多元的推導，失業影響則多半集中社會問題的探討，由於本研究希望從因果連結模式，去探索常民建構失業理論的趨向，因此將專注於歸因探討。



常民的失業理論(文化模式)

(因為 X 所以導致 Y)

圖 3-1 常民失業理論分析架構圖

要理解文化模式如何架構起個人的失業理論並不容易，原因在於文化模式交互滲透(interpenetrate)建構起個人對事務及現象的詮釋觀點，在這些文化模式中，有些模式具有一般的目的；有些則具有特別功能(Quinn & Holland, 1987：15-16)。例如，D'Andrade(1987)提出的美國一般人的心智模式，就廣泛應用在問題解決等認知活動上(White, 1987)。Quinn(1987)婚姻推理的模式，和Clement(1982；轉引自 Quinn, 1987：15-16)發現隱含在精神疾病底下的社會認同價值，則是屬於特定的功能文化模式。因此，從過去文化模式的研究累積結果可

見，要全面地描述文化知識如何架構常民理論，研究取徑的分工是有必要。

基於此，本研究將採多重取徑分析，至於分析架構如圖 3-1。首先，本研究認為先前的文化知識及個人經驗，影響個人對特定事件(即失業)的看法。失業言說的主要特色是因果連結的文化模式，亦即失業理論的建立邏輯是原因 X 導致失業 Y，而根據 Furnham 的分類，原因大致可分為個人、社會結構、機運三大因素。因此，本文將先就所蒐集的失業言說，從 D'Andrade(1987)的心智模式觀點，進行歸因陳述的分析，以了解一般民眾失業歸因的大致傾向。

為了細部檢視常民失業理論的歸因傾向，本研究再從隱喻及敘事出發，解析構成這些常民失業理論的文化模式。在失業的言說中，如前揭文所提，隱喻及敘事是重要的構成成分。解讀失業言說中隱喻訊息，目的是要取得失業理論的底層推理邏輯，亦即失業成因的推理文化模式。此一取徑的論點在於，過去研究顯示隱喻反映思考及語言之間的關係，這些根植於一般人深層結構中的隱喻式概念 (metaphorical concept)，會透過語言呈現系統的樣貌(Lakoff & Johnson, 1980 : 53)。另外，從敘式的角度分析失業的言說，目的是希望發掘不同的社會認同模式，如何架構出內容多元的個人失業理論。此一方法是立論在敘事具有建構個人認同特色的基礎上，從受訪者的敘事中，可以發掘出個人殊異的社會認同文化模式，而產生理論建構的不一致現象。

三、歸因及信仰結構

接下來，本小節將針對研究架構的第一項—歸因--進行理論及方法的介紹。

社會認知學家認為人們在傳送、呈現及運用自身、他人、以及社會世界等相關資訊過程會受到情感、動機、情境、思考風格和喜好等因素的影響。Harvey,

Turnquist & Agostineli(1988)定義歸因為「人們對自己及環境的了解」(Harvey, Turnquist & Agostineli,1988：32)，廣泛來說，歸因是我們對環境認知的一部份(Heider, 1976：18)。他們認為歸因在知覺、情緒、動機及行為扮演關鍵的中介者角色。此外，歸因還具有其他功能，包括知覺控制的強化、保有自尊、自我特有圖像的呈現、以及情感的釋放。

然而在我們一般日常對談中，哪些類型的陳述可以視為歸因呢？雖然許多學者僅將歸因限制在因果關係的判斷，Havey, Turnquist & Agostinelli (1988)則認為歸因可以概念化為對因果關係、責任或個人意向的狀態或關係的陳述。Quinn (1987:181)在進行美國人對婚姻的看法分析時，認為句法及語意也是分析歸因重要特徵。Brewin 及 Antaki (1987：79-98)曾將歸因分為四個類型：(一)描述或標記，(二)道德責任，(三)因果關係及(四)自我呈現。總結而論，歸因的陳述具有以下的幾個面向：首先，歸因的陳述可以是明顯的或不明顯的；第二，歸因可以反映內在或外在控念；第三歸因可以是穩定(跨時一致)或不穩定的；最後歸因具有責任意涵，不管它為情境式或意向式。

分析歸因，簡化(reduction)就成為必須。一般人在面對複雜問題的時候，會將自己的解釋分成一小組清楚的概念範疇。舉例來說，Antaki (1988)曾經訪問一位社會民主黨(SDP)黨員加入該政黨的原因以及對當今社會問題看法，他特別將這位黨員回答當前英國高失業問題進行歸因分析，發現這名黨員認為英國高失業的原因有二：全球不景氣及政府政策。全球不景氣又多半和美國政策有關，特別是緊縮的財政政策，原因是當時雷根政府減少公共支出。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政策多半由首相來決定，經濟相關決定則由財政大臣統籌。從下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這名黨員思考運作及邏輯推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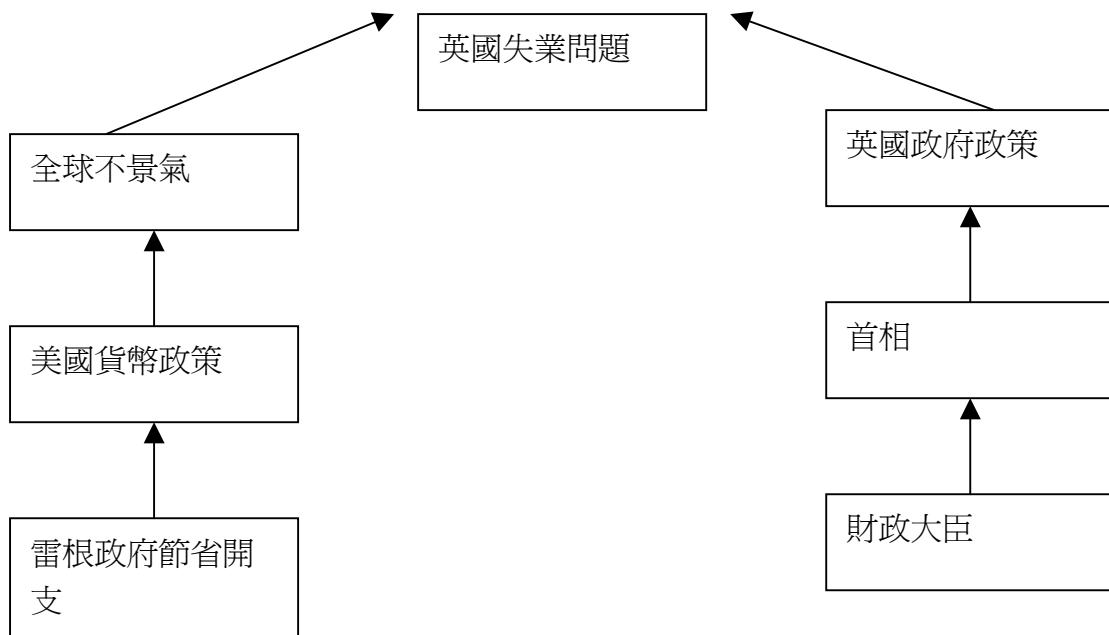


圖 3-2：受訪者解釋英國失業問題因果架構圖(Antaki, 1988 : 66)

在實際分析歸因資料，國內學者也曾經以想法為分析推論資料的基本單位，發展出一套分析規則(鍾蔚文，1992)，想法概念與 Antaki 的概念範疇相類似，不過在實際操作上更為具體。正如前面所提，本研究所有的資料都是日常的談話，因此在分析想法時，要更加留意言語行為(speech act)以及前後相關的語境(context)。我將其概念略作增補，將想法的定義如下：

1. 每一想法可由一至多個單句所組成。不過對話是交互的，會出現主詞省略的情形，或是原因由對談者說出，但經過雙方協商同意，如點頭或回答「是」等。這些都應列為可辨認的想法。
2. 構成一想法之單句必須是在表達同一概念。
3. 想法具有不同的型式。(鍾蔚文，ibid. : 56-57)在本研究中分別為構成支持言說主旨的第二層意義單位，以及語言說主旨無關的獨立意義單位，第一層媒介的歸因角度略而不談。(參見圖 4-3)

4. 每一想法在語意、文法結構、修辭結構(如明顯斷句：第一)，與其他想法有顯著的區隔。但構成同一想法之單句有可能出現在訪談的不同時點，簡言之，如果受訪者再回應不同題目時，出現前面已經表達過的想法時，皆應視為單獨的想法，也就是在登錄時應分開。
5. 兩種相法內容重覆時，視為一種想法。
6. 對言說意義之判定，盡量根據其表面意義。凡文意不清者，不視為想法。
7. 若出現對同意議題提出正反兩面看法時，算作兩個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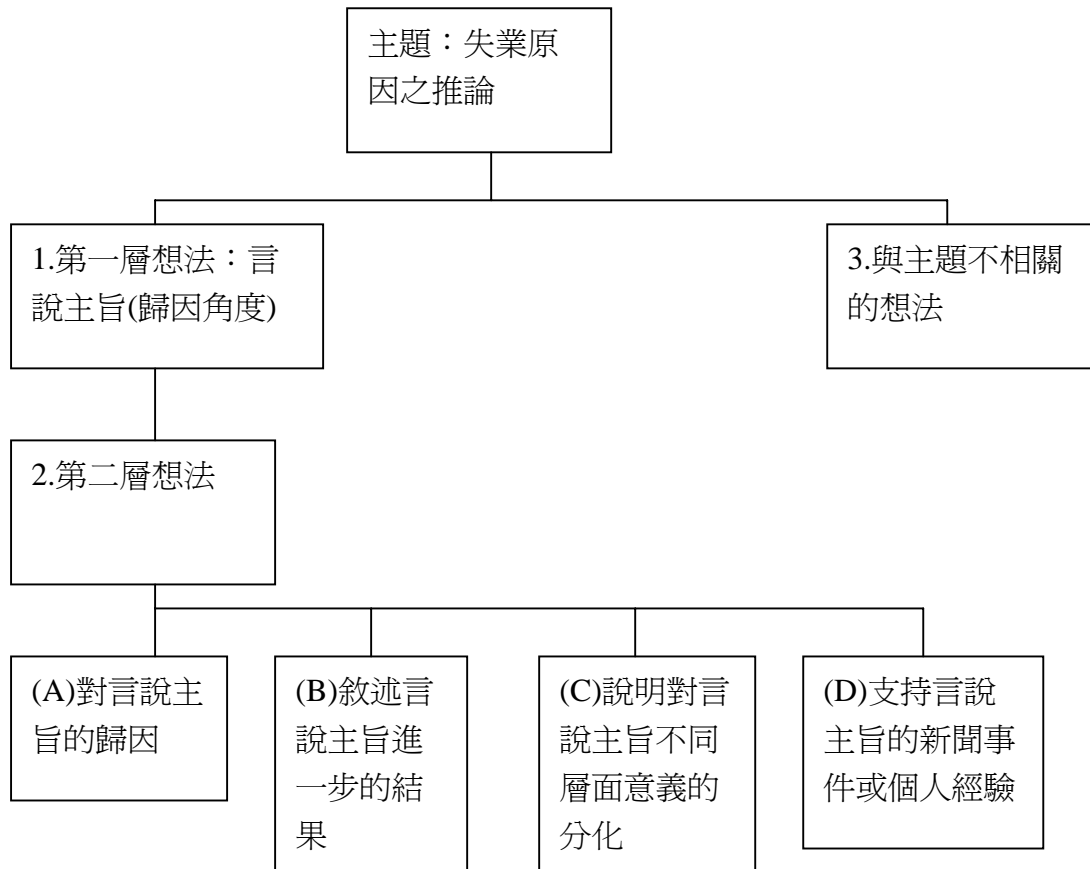


圖 3-3 想法的層次(鍾蔚文，1992:59)

下面這段節錄是受邀的來賓被主持問到工作是不是真的那麼難找時，發表他對中年失業問題的看法：

事實上失業的年齡比較的話，差不多高中年齡的，因為這一些人都是傳統產業的，製造業這一類的，紡織業這一些的，但是這一些就是台灣關門最多的一個行業。所以他們很難找到第二春，因為你要說高科技的電腦，或是什麼你叫她們去做，都沒有辦法。那剛剛說那個外勞如果不請的話是不是這些本勞可以找到工作。然後本勞願意做兩萬多塊的工作嗎？他願意啊！問題是那個外勞搶了他們的飯碗，現在的老闆就是用外勞、引進外勞，把本勞給資遣掉，這樣子你知道嗎？為什麼你知道嗎？外勞第一個叫他們加班…

爲了找出曾先生對失業問題的歸因陳述，我按照鍾蔚文(1992)想法概念，進行分析。第一層想法爲推論時採用的主要角度，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受訪者及與談來賓的個人角度。第二層想法中的(A)言說主旨，在本節錄中指的是中年失業：

因為這一些人都是傳統產業的，製造業這一類的，紡織業這一些的，但是這一些就是台灣關門最多的一個行業。所以他們很難找到第二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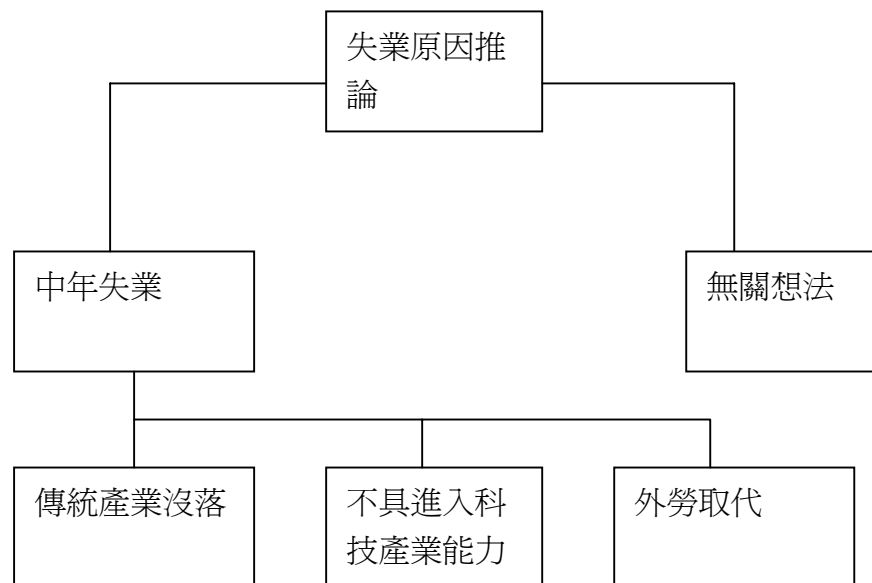


圖 3-4 失業歸因圖

在上面曾先生說明中年失業的原因裡，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因為」條件子句的连接；(B)說明言說主旨的影響、結果。本節錄中並沒有提及，不過類似對失業影響如社會問題增加、治安不好等也出現在本研究的語錄中；(C)對言說主旨不同角度分析；(D)談話中引用與主旨的新聞事件。值得一提(C)和(D)在本語錄中呈現形式並不相同。在失業的言說中，除了少數的與談來賓使用新聞事件，多數與談來賓及受訪者的呈現的多是失業故事。在故事中，呈現失業者失業的故事，本研究認為這仍是必須分析的想法，因此也列入歸因的陳述中，進行失業推論的分析。

四、失業原因的歸類

本小節主要說明失業歸因類目建構過程及方式，說明本文如何根據這些歸因類目進行統計分析。

在失業原因的分類上，如第二章所提，根據 Furnham 分類，可以把造成失業的因素分成個人、社會、機運等因素。不過 Furnham(1988)曾強調，一般大眾所提出對失業的解釋會因為各國的經濟結構及當時經濟狀況而有所不同。再者，社會學相關研究一向注重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強調研究資料必須放回所處的社會世界中，加以解釋並賦予意義(Denzin, 1989)。因此本文認為 Furnham 失業歸因項目應略作調整，以符合台灣現有的失業現象。

首先，我引用台灣官方關於失業研究報告，做為分類失業原因的初步架構。根據勞委會在九十年所進行的〈失業勞工之就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自開辦失業給付至九十年十月，申領失業給付人數已達 12 萬 3 千人。請領失業給付勞工其離職原因以「因虧損或業務緊縮」占 40.5% 最多，其次為任職場所「關廠」占

35.6%。以上二項合計占請領失業給付勞工七成六，為請領失業給付之最主要離職原因。此外，本項研究還針對請領失業給付的勞工進行追蹤調查，發現請領失業給付之後尚未二度就業的原因，主要受到年齡限制、教育限制及待遇太低所致。有工作機會但未前往就業者占 36.8%，其中認為「待遇太低」占 10.6%、「學非所用」占 6.8%，其他的原因還有「工時不合適」、「工作環境不良」、「遠景不佳」等。另 63.2% 無工作機會，其中因「年齡限制」占 35.9%、「教育程度限制」占 14.0%，以及「技術不合」、「工作性質不合」、和「性別限制」等因素。

此外，我也參考學術界對於台灣失業問題的研究。莊慧玲及徐美(2002)針對台灣地區 2052 名受訪者進行訪問調查，結果發現不同失業經驗者對失業問題的認知並沒有太大差異。整體而言，產業外移、關廠、歇業與全球經濟不景氣是大家公認失業問題惡化的三項主要原因。其他依次為台灣競爭力下降、投資環境惡化、政府財金政策不當、失業者工作技能和市場需求不合、政爭、黑金政治、與政黨輪替等。

根據以上兩份調查顯示社會結構因素，也就是外在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產業現況等是造成失業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則為失業者個人能力因素和無法掌握的全球經濟不景氣。本土研究結果，失業的原因仍不脫 Furnham 所列舉的個人、社會、機運三大類，不過也發現類似像「黑金政治」、「政黨輪替」、「台灣競爭力下降」等台灣特有政經現象，也被認為是造成失業率上升的因素。因此，本文認為在三大類中細目則應略作調整，使其更切合台灣目前的社會、政治現況。

在個人因素方面，Furnham 所列的原因多為對失業者負面評價，這樣的結果反映一般人對失業者的刻板印象。為了更切合解釋台灣的失業問題，本研究將 Furnham 現有的細項調整如下：「失業者希望領取失業給付」、「失業者能力或工作態度不佳」、「失業者沒有盡力尋找工作」、「失業者過於挑剔工作」、「失業者工

作技能和市場所需不符合」、「失業者不具一項或多項專長」、「失業者無法適應工作環境」、「失業者缺乏工作經驗」。由於台灣在民國八十八年已正式開辦失業給付，因此本研究將「失業者希望領取失業給付」列為個人因素中。至於不少受訪者談到許多大學生在就學期間並沒有充分準備，導致無法進入就業市場的說法，列為「失業者能力或工作態度不佳」。而學非所用意涵所學的技能在職場上無法發揮，因此持這種說法者列入「失業者工作技能和市場所需不符合」。

Furnham 所謂的社會因素事實上包含政府政策、產業現況和職場環境三方面，這樣考量大致上涵蓋所有的外部因素。值得一提的，他認為強行拆開一般民眾的政治及經濟信念其實並不容易，他認為經濟信念和其他的信念，特別是道德及政治信念緊密相結合，在過去的許多實證研究中，Furnham 甚至指出投票傾向(即政黨傾向)更是影響一般民眾對經濟議題的看法。因此，本研究將台灣的政治因素也因納入考量。所以在政府政策及經濟策略上，我特別區分民進黨及國民黨，這也呼應台灣對政治議題上常見的概念分類。至於將失業原因歸為政黨輪者，本研究將其登錄於民進黨政府政策，其他再增加「投資環境惡化」、「政府財金政策不當」兩因素。在產業現況方面，列入「產業外移」、「關廠歇業或業務緊縮裁員」等因素。「外勞佔據現有工作職缺」、「人浮於事，職場供過於求」、「對失業者年齡及性別限制」、「因雇主不願支付退休金而遭解僱」為職場現況的原因。此外教育問題一直受到關切及討論，因此本研究再多增加「教育制度」一項。至於被許多人提及的全球經濟景氣波動，因為不屬於人為的因素，也不是單一政府政策所能改變的，所以和 Furnham 的列法相同，將它歸類在機運因素。

儘管在類目的建構上，本文依據(1)反映研究目的(2)窮盡(3)互斥(4)獨立(5)單一分類等五項原則(Holsti, 1969)，不過分類(category)總會牽涉到揀選、詮釋的問題，反映的是看問題的方式及思考的角度。在建構類目時，我曾向朋友討論類目建立結果，其中就有人認為「全球不景氣」、「經濟體停滯」、「生產線自動化程

度增加」不應列在運氣的因素。因為從社會經濟學的觀點，這些其實都是人類集體行動的結果，以目前全球經濟環境而言，更牽涉權力及支配或宰制的關係，應該都是屬於人爲的因素。這種觀點雖然言之成理，卻忽略本研究的重要目的：一般人的觀點在本研究中。一般人在陳述這些失業觀點時，是傾向將這些因素視爲一種不可檔的「趨勢」，這種觀點在訪談時亦曾出現，例如 8 號受訪者被問到誰應爲台灣失業率升高負責時回答：

沒有人啊，大環境就是這樣，全世界的失業率都在攀升，台灣也「沒有辦法」置身其外。(引號為筆者所加)

從 8 號受訪者的說法可以得知，大環境——亦即全球經濟不景氣是一種無法抗拒因素(注意他使用沒有辦法一詞)，並不是人爲力量能立即改善的，而這種「不可抗拒」的本質，應該也是執政黨傾向將失業率升高解釋爲全球不景氣使然的重要原因。